

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

林正秋 著



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

林正秋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舒 驰

封面设计 赵 晓

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

林正秋 著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271000

1989年9月第 一 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80518—105—5/K · 18

定价: 4.50元

前 言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誉称；浙江，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浙江人民为开发与建设东南沿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浙江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省之一。

浙江有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六千七百年前的稻谷，是今我国最早的稻谷实物，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四千七百年的丝麻残片，是我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出土的大批陶瓷，雄辩地证明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青瓷的发祥地；誉为世界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者毕昇是宋代“浙东”的工匠……作为一名浙江人，学习探索乡邦的古老历史，令人倍感亲切；如能吸取有益的启示，促进今天地方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无疑是一件颇具积极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

我对乡土历史的兴趣始于六十年代初，二十多年来坚持业余搜集文献，访问古迹、积累史料并开展一些专题研究，“十年文革”也未中断。1981年，我在杭州师范学院开设《浙江地方史》，在编写讲稿的过程，促进了我对浙江历史学习与研究。近十年来，我整理与发表有关浙江历史的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了《南宋都城临安》、《古都杭州研究》、《古代杭州研究》等专著，有些还荣获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优秀作品奖，这对我研究地方史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本书汇编的十余篇论稿，内容涉及经济史、人口史、外
员史、饮食史、文化史、地方史、科技人物、旅游、宗教等
多方面知识。文稿虽较粗糙，但它反映了我近几年学习与探
索乡邦历史的一点成果。正如古人所说：敝帚自珍。今汇集
一本聊作纪念。盼望学者专家多多赐教与批评。

书稿的整理与修改，得到了我院科研处与历史系领导与
老师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吾师徐规教授、王
正平教授、毛昭晰教授和金普森教授、仓修良教授及金敏、
毛飞明同志等指导与诚挚鼓励。本书的编辑出版，还得到了
协和函授学院院长尹俊龙和武建明等同志的大力相助，总
之，凝聚着众多师友的心血。今借本书问世之际，谨向他们
表示深切的谢意。

林 正 秋 1988 年 10 月 于
杭州师范学院地方史研究室

目 录

浙江古代经济史综论	(1)
杭州、宁波海外贸易史略	(84)
浙江二千年人口发展初探	(99)
南宋杭州人口百万考辨	(120)
浙江方志概论与举要	(131)
南宋《临安三志》评述	(174)
浙江历史上的科学家	(206)
试论南宋杭州文化的特点	(246)
浙江馒头传入日本考略——记日本馒头始祖 林净因与34代后裔川岛英子	(261)
杭州灵隐名胜及菩萨简述	(268)
宋代饮食研究与宋菜开发	(306)
《浙江地方史》教学初探	(353)
略谈杭州史研究与杭州经济建设	(361)

浙江古代经济史综论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方圆十万多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自唐宋以降，浙江经济的发展始终排在先进的行列，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誉称；近代工业的起步在全国各省中也处领先的位置；现在，浙江经济在全国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了解与研究我省经济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古为今用，为实现浙江经济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将分原始稻米、丝绸的发祥、春秋时期越国经济、秦汉经济的缓慢增长、六朝经济发展的加速、隋唐五代经济起飞、宋元经济的繁荣、明清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等七个时期分别综述，力求粗略地勾划浙江古代经济的发展线索。

一、原始稻米、丝绸的发祥

原始农业的发展

浙江原始农业的发生在我国较早，从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七千年前后的大批稻谷的事实，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浙江原始人已从采集为主的活动已开始进入了人工栽培稻谷的阶段，这和世界农业发生的最早地区可以并驾齐驱，考古发现的遗物雄辩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世界农业最早的发祥地之

一(1)。据测，这里出土的水稻是驯化的栽培水稻(2)。浙江的地理环境、水土和气候等都和中原诸省不同，原始居民能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栽培稻谷，这是浙江原始居民对农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浙江原始农业的发展可粗分为骨耜农耕与石犁农耕两个阶段。大约距今六、七千前，宁绍一带已初步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局面，进入了广泛使用骨耜农具的阶段。这些骨耜大多采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顶部柄厚而窄，末端刃薄而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大多是长约20厘米、刃部宽11厘米、柄宽厚各约4.5厘米左右。骨面正中有一道浅槽，两边又有平行长孔；把木棒放进浅槽中，用绳索穿过长孔把木棒绑紧，使用骨耜时，用脚踏耜，压入土中。这种骨耜农具，使用方便，提高了垦荒耕地的效率。大约过一、二千年后，由于石犁、破土器等农具的推广而逐渐代替了骨耜，促进了原始农业技术的发展而进入了石犁阶段。近年出土的石犁，今杭州地区有余杭良渚茅庵前、杭州水田畝；嘉兴地区有双桥主城浜遗址；湖州地区有吴兴邱城遗址、吴兴钱山漾遗址及余姚上林湖遗址，说明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已较普遍推广。石犁等农具的使用与推广加快了翻地的效率与耕地的深度，推动了原始农业技术的进步。在石犁阶段，还出现了耘田器，清理水稻中的杂草，加强了田间的管理。

渔猎仍为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浙江境内江湖交叉，鱼类资源丰富。杭州水田畝遗址中出土的木尖状器、穿孔木板就是鱼网上浮标零件；河姆渡遗址、吴兴钱山漾遗址、杭州水田畝遗址均发现木桨，证明当时原始居民乘坐独木舟漂浮在江湖水面捕捞鱼虾已比较普遍。渔捞工具也有骨叉、骨

鏢、骨钩和系有陶网坠、石网坠的鱼网。河姆渡与桐乡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鲤鱼、鲫鱼、鳊鱼、青鱼、鲶鱼、和黄颡鱼等淡水鱼骨和海滨河口的鲻鱼及海生的裸顶鱼等⁽³⁾。随着饲养猪、羊、水牛、狗等家禽的发展，原始畜牧业已出现。

除了种植水稻外，浙江原始氏族公社时期还种植蚕豆、芝麻、花生、葫芦、蕙、酸枣、毛桃、甜瓜等蔬菜杂粮，扩大了食物的品种。

原始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原始手工业。浙江原始手工业主要以制造石器、陶器、竹木器、玉器为主。

从打制石器进入以制造磨制石器为主，促进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最重标志。磨制石器比打制石器琢磨精细，农具种类增多而分工明确，刃部较为锋利，眼孔比较匀称。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改进，促进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使用的推广及制作技术的日益精细，成为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距今的七千前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多是夹炭黑陶，烧制温度较低，胎质较松，器壁粗厚，造型也不规正，制作技术较为简单，表现初期陶器手制的特点。到了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夹细砂的灰黑陶与泥质灰胎黑衣陶，制作较为精细，大多以轮制代替手制，造型较为规正，器表磨得光亮，纹饰有弦纹、篮纹、绳纹、划纹、波浪纹；镂孔技术发达，主要见于豆把上，有圆形、椭圆形、窄条形、长方形、弧边三角形等；陶器种类增多，作炊具的有鼎、鬲、甗、釜，作饮食器具的有钵、碗、盆、杯等，作盛储器具的有瓮、罐等。制陶工艺较为复杂，

日益成为少数擅长技艺者所掌握，逐渐从氏族公社的共同事业日益转变为个体家庭的专业，散布在各自家庭的前后。

原始纺织业起步较早，为浙江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居民大都已会使用陶轮、骨针、木制交纱棒等家庭纺织工具。浙江的养蚕缫纺织技术发展很早。1958年在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麻布、绸片、丝带、丝线等。据专家分析：

绸片黄褐色，平纹织组，密度120根/时，经纬股丝粗度大致相仿，表面细致，平整光洁，丝缕平直。经纬每股丝均由20多根单茧丝交织合成的。单茧丝平均直径为15.6微米，交织而成的股丝直径为167微米。

线带灰白色，为辫状织组，是一根细长的带子；带子外形呈圆形，宽度为44.4——5.85毫米，组合成10股；每股单丝3—4根，捻成一缕；带的直径为433微米，股丝中单丝平均直径为14.7微米。

这些织物，经有关部门化验考证⁽⁴⁾，大约是四千七百年前后的遗物，雄辩地证明，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养蚕缫丝的地区。

竹木编织业的发展，也是浙江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浙江出土的原始时期的木器除生产工具木铲、木矛、木匕、木耜外，还有不少体现江南水乡特点的器具。木器使用较为普遍，杭州水田畝遗址出土的有木盆、穿孔木板、木榔头、木杵、木桨等；木盆口径34厘米，深12.3厘米，是用一块完整的木头剖成的，口沿没有明显的磨痕，平口，弧壁，圆底。木榔头也是一段完整木头制作而成的，一端削小成为柄，另一头去其棱角，稍稍加工成为榔头。木桨四枚，约分两种，一种宽翼形，桨身宽约26厘米，厚约1.5厘

米，宽而扁平，桨翼末端削成尖状，另作柄捆绑其上；另一种为窄翼形，桨宽约10—14厘米，桨身与桨柄是一段木头削成，柄圆锥形⁽⁵⁾。浙江出土的木桨在全国是最早，数量也是最多，余姚河姆渡遗址、吴兴钱山漾遗址等均有发现。这些桨加工虽较粗糙，但从桨板面积形状看，已经认识到桨面越宽，划水所产生的推动船只的力量也越大的重要原理。

竹编器物的出土也较普遍的，有竹席、竹篮、簸箕、竹篓等多种。杭州水田畝遗址出土的一件像竹篓的竹编物，呈三角形，编织相当精细。最为突出的是钱山漾遗址发现二百多件竹编器和芦苇织物堆放在一间长方形的房屋内。所用竹篾条大多刮光，编织均匀，细薄紧密。有的编成一经一纬的人字纹，四边用硬框加固；有的为二经二纬的人字纹，口部用细密的篾条收结；有的还编成梅花眼、菱形花格等，反映了竹编技术的提高⁽⁶⁾。

制作玉器的发达，也是浙江原始手工业发展较为突出的特点。余姚河姆渡、嘉兴马家浜等多有发现，尤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数量最为可观，除发现少数的玉斧、玉铲等生产工具外，以玉制礼器为多，常见的有琕、璜、珠、坠、琮、璧等，大多又有琢磨的痕迹。出土的玉琮，雕琢较为精细，上有兽纹、圆图、线条纹等；花纹虽然较浅，但从艺术上看，刀痕粗壮有力，酷似一种极快的速写风格，如刻蝉，背上用两条交叉的浅刻，便形象地划出了蝉的两支翅膀；又用三、四条很短的横刻线，便粗略地钩出了蝉尾的形态⁽⁷⁾。

木构建筑的房屋是浙江原始居民住宅的特点。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8米的木架建筑遗物，推测是一坐长方形的干栏式建筑，已由打桩立柱架空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到后来的栽柱式的地面木构建筑，有成排の木

桩，大量的横板与竖板，还有很多的带有榫卯的构件，据出土的工具看，这些榫卯是用石器加工的⁽⁸⁾。在嘉兴马家浜、吴兴邱城等建筑遗址，也发现有木柱与木板，木板两端截割整齐，四面平整；房间四周挖有水沟，利用排水；反映了浙江原始居民已从巢居发展到建造木构建筑，营造技术已达相当水平。

二、春秋时期越国经济

于越族在春秋时期兴起，创建了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越国。汉代学者认为于越人是夏禹的后代⁽⁹⁾，有人说和河姆渡的原始居民相关，约到了公元前十世前后曾和中原西周王朝发生联系。在越王勾践以前，于越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今会稽山南部，即今绍兴，诸暨一带平陆山地，过着迁徙的农牧生活；在越王勾践统治前后，于越人逐渐向北迁移至今会稽山东北麓的冲积平原上；这一带平陆土地松肥、灌溉便利，适宜于农耕；于是他们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

城堡的兴建

定居后兴建两座城墙自卫，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载，主要是勾践小城与山阴大城。山阴大城，是勾践派大臣范蠡在会稽山之阴兴建的城堡，汉人称为山阴大城。周围二十里七十二步，有陆门三，水门三，后因吴国军队入侵而毁，此城址约在今绍兴城的东南。勾践小城，据《吴越春秋》载，在山阴大城之西北，周围二里二百二十三步，类似后代的宫城，陆门四，水门一。此城“圆三方，西北龙飞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窠，以象地户；陆门四达，以象八风；外廓筑城而缺西，示服吴也。”此城约在今

绍兴城的西部。

农业的发展

于越迁徙至会稽山东北麓的宁绍平原，为越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利用沼泽平原，发展农业。此处因地势较低，必须兴筑海塘，防止海潮入侵。据《越绝书》卷八载，他们及时兴筑了富中大塘、吴塘与练塘等。富中大塘，离城二十里二十二步；塘成后土地肥沃，勾践把它作为义田，利于居民致富，故名富中大塘。练塘，离城五十里，“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渚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吴塘，是勾践灭吴国后“使(役)吴人筑，”故名，东西千步，原名辟首，后改吴塘。海塘的兴筑，扩大了耕地。保护了农田。当时种植的品种有稷、黍、赤豆、水稻、麦、大豆、秬(麦的一种)及麻、葛等。畜牧业也有发展，养犬、养猪、养鸡较为普遍。据《越绝书》卷八载：

“犬山者、勾践罢吴，畜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县六十三里⁽¹⁰⁾。”越王勾践为了奖励人口生育，曾规定“生大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女孩)二壶酒，一豚⁽¹¹⁾。”说明犬豕的饲养较为发达。淡水养鱼也相当发展。据《齐民要术》引载的《陶朱公养鱼经》相传是越国大臣范蠡撰，学者认为可能是后人伪托，但也反映了越国养殖业发展的情况。范蠡(陶朱公)认为“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他认为辟六亩大的水池，当中垒土堆九处和挖有八个深坑，放鱼饲养；池塘养鱼以鲤鱼为最好，他说：“所以养鲤者，鲤不相食，易长又贵也。”《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会稽山上有目鱼池

(一作木鱼池),因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棲居其中,附近居民养鱼有“其利不租”的优厚。

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越国的手工业以冶炼、造船、织布、制陶等较为发达。

冶炼业的发展。吴越之地,铜锡矿藏丰富,较早地被人开发利用。据《越绝书》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六山者,勾践铸铜;铸铜不烁,埋之东坂。”“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渚,长二百二十五步。”越国以铸铜剑名闻中外。《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庄子·刻意》:“夫有于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关于越国宝剑记载较为详细是《越绝书》,该书说:“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这五把宝剑的名称分别是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相传均为著名铸剑能手欧冶子夫妇所铸。其中湛卢之剑,“去之如水”。这些剑“风吹断发,削铁如泥。”锋利异常⁽¹²⁾。近三十年考古出土的十余把越国铜剑即是最好的证明。浙江博物馆曾陈列过的“越王朱句剑”和“越王诸咎粤滑剑”两把宝剑。朱句,据《竹书记年》载,是勾践的曾孙,而诸咎又是朱句的孙子。剑上铸有鸟缘体的越王名,且嵌有镶边松石,极为精致。1962年秋,在湖北江陵出土的一把越王勾践使用的宝剑,上有“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钅(剑)”八字两行。此剑插在外髹黑漆木胎的剑鞘内,保存完好。剑长约60.8公分,剑身满饰菱形花纹。剑格正面用三色琉璃镶嵌,背面用缘松石嵌成美丽图案花纹。出土时,剑身尚闪烁炫目的光辉。1973年,江陵又出土了一把“越王州句自作用剑,”

长56.2厘米，剑茎上满缠丝绳，有两道箍，首作圆形；剑身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书铭文“戊（越）王句自乍（作）用金（剑）”八字。句即越王朱句，是勾践的曾孙⁽¹³⁾。除了冶铜铸剑较为发达外，冶铁技术也相当发达，青铜礼器和生产工具铸造亦有发展，近年在城南坡塘越国墓葬中出土的铜甗（蒸煮的炊具）、铜尊、铜盃、铜鑑即达十四件；铜器上均铸有精美的花纹和蛇、鸟形图案，尤为珍贵的是一件铜质“房屋模型”，尖顶四角。顶中竖一根八面直柱，柱端立一只鸟；左右两侧山墙装有对称的格子式大窗；后墙有一小窗户，前门敞开，中立两圆柱，屋内又有人物活动的场面。这对研究越国建筑与民俗大有价值。此外，冶铁业也较发达，据《吴越春秋》载，勾践曾派三百童男童女“鼓囊装炭，金铁刀濡⁽¹⁴⁾。”近年发掘的绍兴西施山遗址就出土了许多铁矛、铁锄、铁镢、铁削、铁镰刀等农具，还发现冶炼工场的遗址。

造船业的发展。地处江南水乡的越国，造船业发展较早，正如《淮南子·齐俗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据《越绝书》载，相传孔子游学越国时，曾向越王勾践讲述“三皇五帝之道”，而越王感叹地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点明造船在越国经济生活的重要地位。当时越国建立一支相当强大的水师。据《越绝书》载，“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石塘者，越所害（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越国水师各类兵船较齐全，主要有舠、舳舻、冒突、戈船、三翼等。舠，河内之船的泛称，船上有设有木屋与小窗，因越国最多，故称“越舠”。

戈船，是一种设有戈或矛的战舰，是越国水师的主要品种，约有三百只。鹢舫，是水师的快速小船，船身狭长，船上又有鹢舫的图纹，故名。三翼，水师中较为轻捷灵活的三种战船的合称，往往结成整体出动，故合称为三翼。据《越绝书逸文》载，大翼船，宽1丈5尺，长约十丈，可乘水兵九十余人；中翼，船宽约一丈三尺，长约九丈；小翼，宽约一丈二尺、长约五丈六尺，均配有钩、矛、斧、弩、箭等兵器。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一《船名三翼》考辨说：“大抵皆巨战船，而昔之诗人，及以为轻舟。”冒突船，是水师中担任冲撞敌船为已任的战船，这是越国水师的重要特点。

陶瓷业的发展。近年来，旧越国境内已发现了二十余处烧印纹陶的遗物或窑址，出土有碗、盘、碟、钵、盖、坛、罐等生活用具，器形较为规正，内底有细密的螺旋纹，外底留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痕，表明器物是把坯泥放在辘辘上拉坯成型的，而烧制的温度已达千度以上。由于制陶技术的发展，使浙江境内也较早地出现了原始瓷器。所谓原始瓷器，就是陶器上已带有瓷器的特征，是属陶器向瓷器过度的阶段。原始瓷器和陶器相比，进步有三，一是选择泥土较精，必须清除泥土中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和减少氧化铁的成份；二是外表涂上青釉，避免器表的吸水、污染；三是提高烧温，需达1200℃以上。从现有出土的越国瓷器来看，胎质较为细腻多呈灰白色；器形较为规正，有欽口、深腹圆鼓、平底罐，欽口、扁圆腹，平底甬，欽口浅腹圆鼓平底孟，大敞口，平底碗等；器表涂釉，釉下纹饰以大方格和编织物纹为多。（详见《中国陶瓷史》第80页）

此外，越国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越国种葛织布、享有盛名葛布在商周已始纺织，粗者叫绌，细者叫绤。逐渐从采扎

野生向人工种植过渡。春秋时期，葛布多为贵族、王室的贵重衣料。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葛山者，勾践罢吴（国），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又据《吴越春秋》卷五载，勾践一次贡献给吴国夫差即达十万匹。越国生产的丝织物，也有币、帛、采、罗、縠、纱等，其中币也是一种帛，采即彩，是先染后织的多色丝织品；纱是一种疏薄的平纹织物，即后世的纱，縠，是绉纱一类丝织物，据宋代地方志《嘉泰会稽志》载，“首见于越国⁽¹⁵⁾。”

三、秦汉经济的缓慢发展

秦汉时期的浙江经济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是处于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也较缓慢。东汉时江南经济发展稍有加快，东汉顺帝时，以浙江（即钱塘江）为界，把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这与钱塘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关联。这一时期浙江经济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钱塘江流域农田水利的兴修和纺织、瓷器和铜镜业的发展。

农田水利的兴修

秦汉时期，浙江仍处于人口稀少、农业落后的贫瘠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罢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¹⁶⁾。”但由于汉代牛耕与铁器农具的日益推广，浙江农业技术仍在逐步改进。解放以后，在绍兴漓渚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出土了铁锄、铁镢等工具，证明铁农具在浙江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发展，是这一